

欧洲往何处去？

——2017年德国图书奖获奖小说《首都》评析

徐 畅

内容提要 2017年德国图书奖获奖作品《首都》是一部以欧盟为主题的小说，通过发生在布鲁塞尔的几条平行的情节线索反映了欧盟近年来面临的困境，即其超国家诉求与成员国的民族国家诉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欧洲一体化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阻碍和挑战。尽管作家梅纳瑟对于欧洲一体化怀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这部小说也绝非单纯的政治呼吁，而是表现出了对于复杂现实的足够尊重。

关键词 德国图书奖 《首都》 罗伯特·梅纳瑟 欧洲一体化

2017年10月9日，一年一度的德国图书奖公布评选结果，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瑟（Robert Menasse，1954—）的小说《首都》（*Die Hauptstadt*）最终斩获该奖项的年度桂冠。这个评选结果其实并无很大悬念，因为早在结果揭晓之前，《首都》就是入围作品中媒体关注度最高的一部。究其原因，恐怕与它的主题不无关系。这部小说以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空间背景，几条并行的情节线索全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展开，那就是对欧盟的现状与未来的思考，因此它被称为史上第一部“欧盟小说”^①。对于2017年的欧洲读者来说，这样一部小说的出现，无疑是对某种已经积蓄许久且日益不安的疑虑情绪所做的表达。近年来，随着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问题、英国脱欧、恐怖袭击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欧盟将往何处去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过去二三十年来对于欧洲一体化进展的乐观心态在一次次的重创之下渐趋疲弱，看空欧盟的情绪不断加重。《首都》所获得的关注度与这种情绪不无关系。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首都》获奖之后，评论界的赞誉之声中也夹杂了不少质疑和批评。例如《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就对《首都》获奖极尽冷嘲热讽，暗示这个评选结果是政治考虑压倒文学标准的结果，“当形式感和语言技巧都一文不值而政治议程压倒一切

① Andreas Isenschmid, „Herrliche Drittmittelgedanken“, in *Zeit-Online*, 9. September 2017, <http://www.zeit.de/2017/37/robert-menasse-die-hauptstadt-roman> [2017-10-10]

时”，评委会所宣称的“文学是唯一标准”的说辞根本不能当真。^①

文学、文学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新话题。事实上，政治作为社会现实无可否认地构成了个人具体生存体验的真实组成部分，它与文学本身并不矛盾，但对于具体作品的审美判断却永远都是可争议的，以可争议的审美评判来断言评奖结果的政治性，这样的批评除了令人不由自主地怀疑该批评本身或许恰恰基于某种政治倾向以外，也并不能给读者公众带来任何新的启发。本文认为，《首都》尽管表达了明确的支持欧洲一体化的立场，但作为一部小说，它既不是作者本人的思想传声筒，也绝非单纯的政治呼吁，而更多地是对欧盟复杂的政治现实的敏锐观察和细腻再现。

一、欧洲一体化的“布登勃洛克时刻”

《首都》所设定的小说内部时间与小说的真实出版时间相同，那就是2017年，即为今日之欧盟奠定基础的《罗马条约》签订六十周年。小说中，根据欧洲晴雨表组织（欧洲民意调查组织）在欧盟各成员国所做的一项最新调查，欧盟委员会的公众形象在经历了半年前的“历史低谷”（49%的支持率）之后继续急速下滑，到2017年年初，也就是小说故事开始时，其民众支持率已经前所未有地“跌至地窖深处”^②，即使用尽手段也只能勉强维持在40%，与此相反，欧洲议会的民意形象却上升了五个百分点。为了改善和提升欧盟委员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负责欧委会公众形象的沟通总署准备利用欧委会即将迎来五十周年这个机会来筹办一个庆典活动。欧委会的文化教育总署承担了这项工作。

虽是虚构作品，但这个情节的设定却是对欧盟真实境况的反映。根据欧盟发布的官方介绍文件，在欧盟几大主要机构中，欧盟委员会代表的是“共同利益的守护者”，而欧洲议会代表的是“民众的声音”。^③ 欧委会的委员名额虽然按成员国分配，但这些委员并不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而是要向欧洲法院宣誓按照欧盟的整体利益行事，因此欧委会的人员组成和决策风格具有较强的超脱民族利益的精英色彩，更能体现欧盟的超国家理念。而欧洲议会尽管也是超国家机构，但它基本是按照人口比

① Andreas Platthaus, „Ihn hat es geruehrt, uns geschuettert“, 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9. 10. 2017, <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buecher/autoren/robert-menasse-erhaelt-den-deutschen-buchpreis-2017-15238997.html> [2017-10-10]

② Robert Menasse, *Die Hauptstadt*,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7, S.56.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参见欧盟官方主页上以24种语言发布的《欧盟机构指南》：<https://publications.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d7031407-61e7-4797-99a7-e05369dab332/language-de> [2018-1-18]

例由各国选民直选的，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民众及其所在的民族国家的意志。因此，前者民众支持率的下降、后者的上升，实际上反映了欧盟框架内普通民众的情绪变化，即各成员国利益的声音高涨，共同利益的声音有所减弱，而这无疑意味着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受阻乃至退步，意味着“单个民族对共同体的抵抗”^①。

梅纳瑟曾在2017年2月德国广播电台的一次访谈中借用“布登勃洛克法则”来谈及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在托马斯·曼的著名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中，商业望族布登勃洛克一家在几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家业的兴衰：第一代开创事业，第二代发扬光大，第三代守住家业，第四代开始衰落。^②在梅纳瑟看来，如果把欧洲一体化事业看成一部长篇发展小说，那么它现在正面临着类似布登勃洛克家族第四代人所经历的那种衰落的风险。

梅纳瑟认为，在欧洲一体化这部“长篇小说”中，1992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是其最辉煌的一章，而2007年签订的《里斯本条约》（《里约》）则是情况恶化的转折点。^③《马约》为欧共同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是欧洲联盟成立的基础，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梅纳瑟将其视为欧洲一体化的一个辉煌高峰很好理解。但《里约》作为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条约，它的正式生效为欧洲进一步一体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得欧盟具有更强的行动能力。为什么梅纳瑟却将其视为恶化的转折点呢？

原因在于，《里约》其实是欧盟制宪危机妥协的产物。欧盟制宪的议题是在欧盟东扩之后以法典形式巩固现有成果并进一步深化欧盟的努力。但欧盟宪法条约在经历了异常艰苦的谈判于2004年被政治精英们签署之后，最终仍被部分国家的全民公投否决，致使制宪行动搁浅。直到2007年，欧盟领导人做出在新条约中剔除“宪法”字眼，舍弃让人联想到超国家性质的盟旗、盟歌等决定，并在此后的政府间谈判中对英国等成员国的要求作出一系列的让步，才最终促成《里约》的诞生。就是说，《里约》虽在实际上行使一定程度的宪法功能，但同时也标志着使欧盟变成实体性超国家机构的努力受阻失败。而梅纳瑟本人恰恰就是欧盟作为实体性超国家机构的积极主张者。2013年，他曾与德国左翼女政治家乌尔里克·居罗克（Ulrike Guérot）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欧洲共和国宣言》，其根本宗旨就是超越

① Menasse, *Heimat ist die schönste Utopie. Reden (wir) über Europa*,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4, S.75.

② „Europa - ein Roman ohne Helden. Robert Menasse im Gespräch mit Nana Brink“, http://www.deutschlandfunkkultur.de/25-jahre-vertrag-von-maastricht-europa-ein-roman-ohne-helden.1008.de.html?dram:article_id=378318.

③ „Europa - ein Roman ohne Helden. Robert Menasse im Gespräch mit Nana Brink“.

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建立一个实体性的超国家机构。因此，《里约》所代表的制宪失败在他看来自然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停滞乃至退步。不仅如此，《里约》还为成员国退出欧盟铺平了道路，其第五十条的退出条款规定任何成员国可以根据本身的制宪要求而决定退出联盟，并制定了实施程序。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就与该条款的制定有直接关系。

英国脱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创，其对民众心理上的影响或许更甚于其他方面的后果，因为它让人们切实地体会到了欧盟这个超国家机构的脆弱性。实际上，随着民粹主义和右翼力量的崛起，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和否定之声日益高涨，甚至有很多民众开始将欧盟视为一种威胁。早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期间，民众支持率擢升的法国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就曾公开提出退欧的要求。退欧也好，小说中欧委会支持率的下降也好，这些威胁着欧盟合法性形象的声音虽然在总体上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们却将欧盟面临的根本矛盾更加直白地呈现了出来，那就是欧洲共同体的利益、成员国利益乃至个人利益之间的纠葛。

矛盾首先在个人的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共同体利益无人关注。梅纳瑟之所以悲叹欧洲一体化已经发展到了布登勃洛克家族第四代的阶段，原因之一就是，这一代欧盟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创立者们的初衷。在小说中，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欧盟大楼中那些被同僚们称为“蝾螈”的官员们身上，争夺更有实权的部门成为“蝾螈”们的最大动力，因此欧盟机构中的职位分配和竞聘过程始终伴随着种种“勾心斗角、权谋和利益交换”（*Hauptstadt*: 29）。虽然整个机构中也不乏梅纳瑟心目中那种坚持共同体理想的年轻官员，但他们只是少数，并且在现实中屡屡遭遇困境。

欧盟机构内部为个人私利而进行的勾心斗角只是一个缩影，折射的是机构以外的大部分欧洲人对于欧洲共同利益的冷漠。正如小说中民意调查的数据所显示的，共同体利益渐被遗忘是与成员国利益诉求的呼声上涨相伴出现的。在梅纳瑟看来，这一变化背后的民族主义驱动乃是“欧洲一体化”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大反派”^①，它是欧盟力图克服但又始终难以真正超越的障碍。在2012年出版的文集《欧洲信使》中，梅纳瑟写道：“如果我们在一张欧洲地图上把有史以来陆续出现过的全部政治边境都用黑笔划出来，那么这片大陆就会被一张黑压压的大网所覆盖”，如果再用红笔把这块大陆上发生过的所有战争都一一标出来，那么整个欧洲地图就会变成血红一片。^② 国家疆界在欧洲

① „Europa - ein Roman ohne Helden. Robert Menasse im Gespräch mit Nana Brink“.

② Robert Menasse, *Der europäische Landbote. Die Wut der Bürger und der Friede Europas*, Wien: Paul Zsolnay Verlag, 2012, S.7.

历史上的每一次变动，都伴随着无数的流血战争，而奥斯维辛大屠杀则是民族国家利益争夺所制造的最惨痛的灾难。梅纳瑟认为，战后的法德等国为欧洲一体化而做的最初努力，就是基于停止民族国家之间相互残杀、避免流血冲突的愿望，但时至今日，随着时间的流逝，惨痛的历史教训面临着与一体化的初心一并被遗忘的风险。

在小说中，身为文化署署长的色诺珀鲁主动承担了筹办欧委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任务之后，要求手下的官员马丁·苏斯曼设计活动方案。苏斯曼起初苦思无果，后来在一次出差参观奥斯维辛大屠杀纪念馆的过程中获得灵感，提出了以“奥斯维辛永不重演”为口号的活动方案，而邀请一些仍在世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参加庆典，是该活动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工作人员们开始着手联络在世的大屠杀幸存者，但此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竟然找不到一份完整并及时更新的幸存者名单。

事实上，当欧盟的工作人员想尽办法寻找大屠杀幸存者名单的时候，一位近在他们身边的幸存者、比利时裔犹太人大卫·德福润德正在一家养老院里默默地列着这样一份名单。由于年老体衰，德福润德在小说一开始时就已经卖掉了自己位于布鲁塞尔市中心的房子，住进了这家郊区养老院。年迈的他记性一天比一天差，于是他开始用一张纸把他所知道的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字一个个写下来，然后再随着他们离世的消息传来而将这些名字一个个划掉。在小说结尾，德福润德在一列遭遇恐怖袭击的地铁列车中丧生，而此前，在他所列的幸存者名单中，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全部名字都已经被划掉。

与德福润德登上同一班地铁列车的还有小说另一条线索的主人公阿洛伊斯·艾哈特教授。艾哈特是梅纳瑟在小说中投射他本人思想主张的一个形象。他是一位来自奥地利的退休经济学教授，积极主张继续大力推进欧洲一体化，为此他两次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的民间智库论坛。艾哈特认为民族主义并非不可超越，人们可以采取诸多具体措施来促进欧洲公民的欧洲认同，而他提出的措施之一就是：将奥斯维辛设为未来的欧洲公民联盟的首都（*Hauptstadt*: 391-392）。然而这个提议以尴尬收场，会场上那些被他指责为“对历史一无所知，对未来毫无想象”（*Hauptstadt*: 390）的经济专家们更关心怎样甩掉希腊债务危机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做完这个发言之后的第二天，艾哈特搭乘地铁去往机场返回维也纳，因此他也在恐袭中丧生了。

大屠杀的最后一批幸存者和为铭记历史而大声疾呼的老学者同时离世，这个情节设计的象征意味非常明显，那就是随着一代人的离去，对于大屠杀的记忆将会消失，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训将被人们遗忘。这也是梅纳瑟认为欧洲一体化已经陷入布登勃洛克家族第四代处境的深层原因。

二、民族与超民族：看不见的国界线

与梅纳瑟共同发表《欧洲共和国宣言》的德国左翼女政治家居罗克曾表示，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只在人们失去了所有其他身份骄傲和认可的因素时”才是成立的，“民族主义是失去了生活机会的人们使用的替代品”^①。按照这种理解，民族主义仅仅是一件防御性的外衣，只要能创造更好的生活，它就可以被欧洲这件更大的外衣所替代，然而事实也许并不如此简单。超越狭隘民族国家利益以减少流血冲突，的确是从欧洲煤钢联合体以来的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方向。无论是申根国家之间取消内部边境，还是欧元作为统一货币的使用，以及欧洲内部的关税同盟，都是这一努力的成果。在梅纳瑟和居罗克看来，这一进程应该继续向前推进，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形成一种欧洲集体认同。然而现实的困难不容忽视，其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

欧洲国家使用多种不同语言，欧盟通过多语制来体现共同体内部的平等和文化多样性。这个原则在共同体创立初期几乎没遇到什么问题，因为欧盟的前身在刚成立时只有六个国家，其中还有三个国家主要使用法语。但随着成员国数量的持续增加，目前其所采用的官方语言已经达到二十四种之多，多语制原则的潜在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

一是实际沟通问题。尽管欧盟为解决多语言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比如通过推行“母语加两门外语”的早期语言教育政策以及其他各种“促进语言学习和语言多样化”的行动计划来加强每个欧洲公民的多语言能力^②，但其效果终究有限，能够真正掌握多种欧洲语言的始终只是少数精英人群。不过由于生活范围的地域性，这个问题在普通民众的日常沟通层面还不算突出，但在文化产品，尤其是语言文化产品方面，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民族”这个事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首都》本身便是极好的例子。为了勾勒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欧洲形象，梅纳瑟在这部小说中煞费苦心地穿插使用了法语、英语、波兰语、荷兰语、希腊语等多种欧洲语言，同时引用雨果等非德语作家，颇有把这部主题上的“欧盟小说”写成一部气质上的“欧洲小说”的意思；然而这些多语因素只能局限于间或出现的简单对话和引语，小说的压倒性语言还是德语，其他语言的穿插出现，其装饰和象征意味大于实际意义。但即便如此，这些数量不多的“外语”还是会对一般德语读者构成阅读障碍，很多读者甚至可能压根无法辨别它们究竟是哪国语言，而对于以这些少量语言为母语的读者来说，一两个母语句子

① 覃里雯《[专访] 德国学者乌尔利科·居罗特：为什么欧洲必须建立共和国》，<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071665.html> [2018-1-16]

② 王雅梅《从欧盟的“特性”透视欧盟多语政策》，载《德国研究》2010年第1期，第20页。

当然绝不可能就把这部德语小说变为他们可以读懂的作品。换句话说，能一字不落地完全读懂这部“欧盟小说”的“欧洲人”即便真的存在，也是寥寥无几。

所以翻译问题始终是欧盟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其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日常乃至文化沟通的实践层面，而是在于语言所蕴含的文化认同的困境及其所带来的政治课题，后者才是真正的难题。欧盟现有官方语言二十四种，这意味着欧盟工作文件以及所有正式会议上的巨额翻译费用，这项支出现在已经达到每年十多亿欧元。此外，从实际效率角度讲，这种官方语言的多语制对工作效率也造成极大妨碍。然而欧盟又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翻译并不是欧盟语言机制的最大问题，而政治敏感才是真正的障碍”^①。欧盟之所以耗费巨资维持如此之多的官方语言，正是因为语言问题具有某种“爆炸性”：“就算不涉及民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它已深入到了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通过语言的使用来定义和描述自身的存在，确立什么是自我的、什么是异己的，因此语言与民众对一体化进程的认可密切相关。”^②由是观之，多语制原则以及二十四种官方语言并存的现实，所折射的正是共同体内部的民族国家身份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的历史也是其语言的历史，语言与欧洲是一个硬币的两面”^③。语言是民族认同的扎根之所，母语是每个人心中的故乡，尽管申根协定在申根国家内部取消了边境，但可以说，语言和民族文化遗产的差异仍然作为看不见的国界线继续存在，而这也意味着，用欧洲集体认同来取代民族心理认同的道路不仅障碍重重，而且前途渺茫。语言问题的这种政治敏感性，导致多语制政策处于一种悖论式处境，那就是它在事实上恰恰强化了那道看不见的国界线。比如爱尔兰语，由于只有极少量的爱尔兰公民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使用爱尔兰语，所以爱尔兰在最初加入欧盟时并未提出将爱尔兰语作为欧盟官方语言，但在多语制实践的反向影响之下，它于2005年追加提出了这一要求。此外，按照多语制所体现的这种语言与民族国家对应的原则，既然英国已经通过了脱欧公投，英语在欧盟官方语言中的去留也就成了一个问題，因此英语目前已经连带着被置于一种“强制脱欧”的呼声中。

对于欧盟政策制定的这种悖论处境，梅纳瑟是有深刻认识的，这一点在小说中主要通过色诺珀鲁的国籍身份问题得到了充分展现。色诺珀鲁是一个出生于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贫穷的童年生活促使她一心想要出人头地。她在希腊大学毕业后持希腊护照

① 王小海《欧盟语言多元化现状、问题与对策》，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44页。

② 王小海《欧盟语言多元化现状、问题与对策》，第44页。

③ 王雅梅《从欧盟的“特性”透视欧盟多语政策》，第22页。

进入欧盟，但不是作为希腊政府派遣的代表，而是经由欧盟委员会的自由选拔程序进入欧盟，因此不占用成员国名额。色诺珀鲁在情感上可以算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欧洲人”，她对自己的母国塞浦路斯并无太多感情，小说一开始就借着餐厅点餐的情节表明了这一点，“她没有乡愁，对家乡菜肴的味道和芬芳也毫不怀念”（*Hauptstadt*: 30）。但就是这样一个按照“欧洲共和国”的理想标准来说脱离了民族情感之趣味的人，竟然在小说结尾时放弃了希腊护照，换回了母国塞浦路斯护照，因为她可以通过塞浦路斯护照直接进入贸易总署，在欧委会获得曲线升迁的机会。这件事的讽刺与多语制的悖论极为相似，两者都表明欧盟在处理民族国家认同和欧洲集体认同这个问题上的制度困境。

三、猪肉战争、功能主义与各怀心思的成员国

相比于语言问题和认同问题，对于欧洲一体化更直接的障碍来自各成员国之间乃至各种民间利益之间的现实冲突。小说有关猪肉出口问题的描写就是一个例子，这一情节的主角是弗洛里安·苏斯曼，他是奥地利最大的生猪养殖和交易商，同时又是欧委会官员马丁·苏斯曼的哥哥。弗洛里安一向对欧盟的生猪养殖和贸易政策不满，他认为相关部门的欧盟官员们做不出任何明智的决策，因此他只能亲自参与政治，每年频繁前往布鲁塞尔去游说欧洲议会的议员和欧委会的官员们（*Hauptstadt*: 70）。

小说塑造弗洛里安这样一个猪肉交易商的形象并非随意为之，因为自2014年以来，争夺中国猪肉市场就是欧洲各国生猪养殖交易商们持续关注的热点。作为猪肉及副产品的消费大国，中国的猪肉消费需求在全球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而且这需求中还包括大量猪耳朵、猪舌头、猪肝等在欧洲往往被视为“屠宰垃圾”（*Hauptstadt*: 72）、因而在本土价格极为低廉的副产品，对于欧洲的生猪养殖和交易商们来说，这意味着额外的高额利润，他们自然不想放弃这个巨大的市场。然而，正是因为需求巨大，中国方面只会与大型供应商签署进口协议。弗洛里安尽管是奥地利最大的猪肉交易商，但他的企业无法满足中国方面的哪怕是单独一单的需求，因此他寄望于欧盟能够与中国签署相应协议。但欧盟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无能，不但不能出面签署这样一个有利于小成员国生产商的总体协议，而且还任由德国等大成员国单独与中国签署双边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内部之间在价格竞争中相互打压（*Hauptstadt*: 71）。

猪肉出口的竞争尽管只是以个体商户视角讲述的一个似乎无关欧盟大局的微小案例，但其背后反映的问题却对欧盟自身理论基础构成了某种质疑和挑战。欧盟的前身

一般被追溯至战后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最初的一步是依据著名的欧洲联合理论家哈斯（Ernst Haas）的功能主义理论迈出的。按照哈斯的理论，欧洲联合的基本途径是“在民族主权国家之间首先实现个别区域的一体化，然后针对具体需要逐步完善和扩展合作的程度和领域”，最后“通过渐进的方式将对主权国家的忠诚转移到超国家的机构上来”^①。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能发展到今天，功能主义理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其核心观点其实就是暂时搁置政治等其他领域的争议，先在经济层面上实现成员国的一体化。随着成员国之间共同的经济利益发展到不可分割的程度，对于共同的政策、外交乃至防务的需求也就会呼之欲出了，事实上这的确最终促成了今日的欧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形成。

然而，正如《首都》借助猪肉出口事件以及《里约》的签订所体现的那样，欧盟发展到今天，功能主义理论愿景中的经济统一倒逼政治一体化的发展道路障碍重重，这无法不令人怀疑，克服和超越民族国家是否当真是欧洲一体化追求的真正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欧洲统一理论研究中就出现了一种以英国学者艾伦·米尔沃德（Alan Milward）为代表的新的声音。米尔沃德不否认二战共同灾难是欧洲一体化努力的直接肇因，但与之前占统治地位的看法相反，他认为，启动欧洲一体化其实是西欧国家在战后欧洲各国普遍衰弱的政治形势下所采取的民族自救的手段。“大战的经历证明西欧的民族国家竟然不能履行其基本的职能，即维护自己公民的安全、保护他们的生存与财产”，这种危机表现为公民对本国政府的信任危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将民族国家拯救出来成为战后欧洲历史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②，选择一体化其实是为了加强西欧民族国家的地位而不是削弱它们。在此背景下，将有限领域的国家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就成了西欧各国在战后萧瑟局势中抱团取暖的需求，“选择一个崭新的国际框架即一体化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难，首先是因为这个框架符合这些国家的特定利益需求”^③。

民族国家的利益诉求深深扎根在欧盟的历史和现实之中，很难真正被撼动。作为一个十几年来潜心关注欧盟问题的作家，梅纳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奥斯维辛永不重演”的活动方案在小说中从头到尾都是以高度反讽的方式处理的：色诺珀鲁希望借助这个项目平步青云，而马丁·苏斯曼也只是颇为偶然和随意地提出了活动方案。事实上，只有政治经验不足的年轻官员们才会懵懂地将其视为一个

① 程昱编著《欧洲联盟》，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6页。

② 洪邮生《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欧洲修正派”述评》，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15页。

③ 洪邮生《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欧洲修正派”述评》，第115页。

可行方案，对于欧委会里那些浸润政坛多年的政治老手们来说，该方案的尴尬之处和它最终必然失败的命运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让大屠杀幸存者出席欧委会五十周年纪念庆典，等于是：

让证人们列队出场，用他们自身的经历和命运来证明，是民族主义最终导致了奥斯维辛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犯罪，而这样一来，欧盟委员会的道德责任就必然变成了为超越民族而努力。从“奥斯维辛永不重演”的套话中推导出“超越民族主义”的诉求，并最终推导出“超越民族”的诉求，然后把这作为对欧盟委员会的道德要求，作为它的政治任务向欧洲公众兜售，这是各民族国家的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们绝不会接受的。（*Hauptstadt*: 330）

然而，负责接见色诺珀鲁的欧委会主席首席顾问罗莫洛·斯特洛齐也深知，欧委会主席不可能公开反对这样一项政治正确并以提升欧委会公众形象为目标的活动方案，同时他也不想让这个烫手的山芋掉在自己怀里，不想让它“弄脏了自己的西服背心”（*Hauptstadt*: 328），于是他找到自己的好友、欧洲理事会主席的书记官阿提拉·希德库提，授意他将这个活动议案的消息私下传播出去。消息传出的第二天，匈牙利外长就给奥地利外长打了电话，而早就因难民政策而对欧盟不满的奥地利外长立刻表示要同匈牙利一道捍卫各自的民族利益（*Hauptstadt*: 331-332）。随后，波兰政府也迅速有了反应，它要求本国官员抵制欧委会蓄谋的这场伤害波兰民族自豪感的运动，并且让他们务必要向主办方表明：奥斯维辛大屠杀集中营是德国人犯下的罪行，因此完全是德国的问题，他们衷心欢迎德国把奥斯维辛集中营从波兰搬到德国去当博物馆（*Hauptstadt*: 334）。

就这样，希德库提只是轻轻推动了一下，一整套连锁反应就启动了。在他和斯特洛齐看来，通过这样一场“人工造雨”（*Hauptstadt*: 330），欧委会上层不必亲自出面就可以借助各国政府之手浇灭这场活动的小火苗：

阿提拉·希德库提暗自微笑。不出所料，当自己民族的……什么呢，身份认同，或者甚至是存在权受到质疑的时候，果然是小国家们最快速地做出了抗议。对此大可放心。对此大可利用。但更大也是更关键的问题是，德国会作何反应？法国呢？英国已经退出游戏了，尽管它还在场边转来转去。希德库提估计，联合王国很有可能会在家偷偷指示它的官员们支持该项目，敦促其公开化，好以此作

为退欧之必要性的另一个证据，来封堵国内政治舆论。（*Hauptstadt*: 335）

在短短几页的情节中，民族国家主权让渡的界限和成员国们各怀心思的利益考量清清楚楚地显现出来，充分证明了基于超民族理念的理想主义方案与欧盟复杂的现实多么格格不入。作为一个历史上始终乐于维持欧洲大陆均势并且如今“已经退出游戏”的国家，英国是唯一支持该方案的，因为假使这个方案真能获得通过并加以实施，欧委会的形象必定会一落千丈，而“糟糕的欧委会形象是好事。对英国来说……”（*Hauptstadt*: 379）。至于小说中并未直接刻画的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大国的反应究竟如何，其实已经并不重要，因为将欧盟视为大国博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种看法素已有之，尤其是涉及德国的时候，舆论界从来不乏一种声音，就是将欧盟视为德国的政治经济霸权的白手套。例如英国历史学家泰莫西·加通·艾施就曾在其《以欧洲的名义》一书中公开言明：“1945年以后，德国政治不敢公开诉求民族利益，于是，貌似出于公心，将民族诉求转化为欧洲共同体的共同目标。”^①

尽管梅纳瑟本人对于欧盟所怀有的理想是哈斯式的，但小说所呈现的欧盟国家利益之争，相对来说却更符合米尔沃德式的认知图景：对于欧盟这个通过成员国一定程度的主权让渡而结成的共同体来说，超越民族国家只是其表象，捍卫和保存各自国家的民族利益才是其内在动因。自身利益是永恒的考量，就连退欧公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与欧盟讨价还价的手段。如果说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梅纳瑟在现实中始终都在为自己明确的政治主张奔走呼吁，那么作为小说家的他显然表现出了对于复杂现实的足够尊重。

结语：欧盟没有故事？

作为一名关心欧洲命运的知识分子，梅纳瑟在谈论欧盟问题的随笔和演讲稿中，语气通常是严肃甚至不乏沉重的，但在作为小说作者出现时，他的语言风格却呈现出多层次和多面性：讲述德福润德和艾哈特的部分仍然保留了那份严肃和沉重，但在讲述其他内容时，轻快幽默的戏谑和反讽所占的比重更大一些。但与此同时，对于欧洲命运的反思，并未因这种戏谑和反讽而丧失其份量。小说中那头猪的形象就是一个例子。

《首都》开头的第一幕场景，就是一头猪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东奔西跑。这是一头普通的家猪，很可能是从养猪场跑出来的，它在布鲁塞尔市中心慌不择路

① 转引自海因茨·史腊斐《德意志文学简史》，胡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地跑来跑去，无数布鲁塞尔居民亲眼目睹了它，其中就有包括色诺珀鲁、德福润德、艾哈特、马丁·苏斯曼等人在内的几乎全部小说主人公，这些人物中的多数彼此互不相识，直到小说结尾，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都没有交集，因此，毫无疑问，这头猪具有将几条叙述线索串联起来的功能，但它的作用却绝不仅仅是纯粹形式上的。

按照梅纳瑟本人的解释，猪在欧洲传统文化心理中具有双面性，它既是一种寓意幸运的动物，又是一个骂人词汇。当这种具有两面性的文化心理内涵再与另一些因素相遇时，其意味似乎更加复杂，比如弗洛里安的猪肉出口计划就反映了欧盟在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再比如小说开篇伊斯兰教徒穆斯塔法差一点被“这头肮脏的动物”（*Hauptstadt*: 13）撞到这个情节，显然暗示着数量日益庞大的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欧洲之间的潜在冲突。

对于这头奔跑在布鲁塞尔街头的驯养家猪，还可以有一种更形而上的解读，那就是已经被纳入管理之下的自然事物（家畜）脱离了人为管控，闯进早已远离自然的、充满人为规则的大都市，所到之处令原本井然的文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在这种意义上，它无疑是对欧盟危机处境的某种影射。那么这头猪到最后究竟是会突然显露出某种类似于“灰犀牛”^①般的危险面目，还是会表明自己终究还是一头为人类带来好处的温驯家畜？小说对此没有回答。在小说结尾，这头动物突然神秘地消失了，“无影无踪地消失了”，随后出现的一个简短的法语词组“未完待续”（*À Suivre*）结束了整部小说（*Hauptstadt*: 459）。

事实上，欧盟一路走来始终步履维艰，尤其最近十年来更是面临大量密集而棘手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利益导致相互斗争，但它也促成区域联盟。就此而言，欧洲一体化既带有天然的脆弱性，又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鉴于这种矛盾属性所导致的前途未知，“未完待续”不失为对目前欧盟事业的最好概括。或许正因如此，《首都》并没有被讲述成一个情节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因为我既不希望自己也不希望任何他人讲述一个毫无疑问地充满紧张的故事，因为那将无疑意味着欧盟的破碎，意味着欧洲退回到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状态。”^②梅纳瑟这番话中所透露的担忧之情表明，在他心目中，没有故事才是欧盟最好的故事。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杜新华

① “灰犀牛”是2017年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金融术语，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② Robert Menasse, *Der europäische Landbote. Die Wut der Bürger und der Friede Europas*, S.10.